

稽古传新 两河寻珍

——评「两河遗珍」新时代聊城考古成果精品展

■ 叶世明 令狐东昌

6月24日,聊城中国运河文化博物馆推出新的展览“两河遗珍”——新时代聊城考古成果精品展。该展览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、聊城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,聊城市文物事业服务中心承办,整个展览立足考古,是对聊城考古工作的集中展示和阶段性总结,也是对本区域文明发展历程的系统梳理,意在深化公众对“两河”流域古代文明的理解与认同,提升对考古工作的认识与热爱。开展一个多月,观者云集、广受好评。

新时代以来,聊城紧紧围绕乡建设发展大局,同步开展文物保护工作,在全市进行了大规模地下文物调查分区、考古前置与系统性考古发掘工作。诸多湮没于岁月尘埃中的古聚落、古墓葬与古遗存相继重见天日,大批承载地域历史、见证文明变迁的珍贵文物得到妥善保护与系统研究,为“两河文化”传承、古城文脉赓续留下了丰厚的实物遗存。

汉晋气象 河济辉煌

展览的第一单元为“汉晋气象 河济辉煌”,展示了汉代遗址和墓葬共三次发掘工作,其中有两处是在高唐县,一次在旅游度假区境内。高唐县高店村遗址发掘探明灰坑、河道、墓葬、道路等遗迹43处,并出土“大泉五十”铜钱,据此初步判定高店村遗址为西汉至王莽时期遗址。值得特别注意的是,该遗址出土的“长乐未央”瓦当,为汉代官式建筑构件。

高唐固河镇二干渠后吴墓地共发掘清理砖椁墓十座,出土大量陶器,品种繁多,形成以陶灶、陶井为特色的地方明器组合。度假区南齐汉墓为东汉时期墓葬,其中M2墓规模宏大,分为东墓室和西墓室,采用中轴对称式布局,总平面为“中”字形,是目前山东省内所见规模最大、结构最复杂的东汉大型砖室墓。

早在1956年,高唐固河镇就曾出土一件四层檐虎殿顶绿釉陶楼明器,陶楼通高144厘米,斗拱为一斗三升,形制等级极高,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。结合本次展出的汉代遗存综合分析,两汉时期的高唐曾是鲁西地区政治、经济、文化较为重要且发达的区域。本次展览展示的冠县东古城晋代墓地,共清理晋代砖室墓五座。墓葬虽早年被盗,出土文物较少,但此次发现是聊城境内首次发现晋代墓葬,具有重要考古价值。墓中出土的铜带钩形制精美,同时出土的陶质帐座亦较为罕见。

大唐胜迹 琼藏重光

展览的第二单元是“大唐胜迹 琼藏重光”,唐代遗存是此次展览的重头戏。

近年来,鲁西地区发现大量唐代墓葬,莘县、冠县、在平均有分布,尤以东昌府区唐墓发现最为集中。谈及此处,便需梳理聊城的城市变迁史。

聊城地处华东黄河冲积平原,属于黄泛区。据史籍记载,聊城在历史上曾出现过四座城,前三座都是被洪水冲毁的,所以聊城曾三迁城址。聊古南城是聊城的第一个城址。隄陵城现址位于聊城高新区境内,是聊城的第三个城址。第四个城址就是现东昌古城址。这三处城址都经过了考古勘探,发现有城址遗迹,而且均与文献记载相符,可以相互佐证。

唯有第二座城址始终扑朔迷离。它始建于北魏泰常七年(422年),当年,拓跋弥受封安定王。《水经注·卷五》记载:“魏泰常七年,安定王镇平原所筑,世谓王城。”北魏太和二十三年(499年),朝廷罢镇立平原郡,治所设于此城;同年,博州聊城县治亦从聊古庙城迁至此处。王城最终毁于后晋开运二年(945年)水患,存续446年,隋唐时期的博州治所便长期设于王城。历代聊城考古专家与历史学者虽多方探寻,但王城遗址始终掩埋于厚厚的黄土之下,未曾向世人展露全貌。

从“近年来聊城市发掘项目一览表”“新时代聊城市考古发掘示意图”中可以清晰看到,东昌府区唐代墓葬出土遗存高度集中,九大唐墓群均环绕光岳路—徒骇河橡胶坝一带分布。其中董桥村、绳张、傅大门、孟冢等多处唐墓群均出土墓志铭,墓志铭文明确记载了唐博州的地理信息,且全部指向光岳路—徒骇河橡胶坝一带。至此,尘封千年的王城遗址终于展露踪迹。目前已完成的考古发掘工作,大多集中于王城遗址北部。从发掘情况来看,唐墓现存地表距现代地面约五米。受黄河泛滥淤积影响,部分墓葬下葬后不久即被泥沙掩埋,隐蔽性

极强,基本未遭盗掘;另有部分墓葬选址地势较高,早年已遭盗扰。

这批墓葬均以青砖垒砌墓室,形制丰富,包含穹顶马蹄形、盪顶马蹄形、舟形、圆形等多种样式。出土器物涵盖陶器、瓷器、三彩器、铜镜、漆器、铁器等,多为日常生活器具。结合墓志记载可初步判定,王城遗址北部为唐代平民墓葬区。在平唐代考古的核心亮点为在平沙窝高古墓葬群。齐临高速建设配套考古发掘中,共清理宋代墓葬1座、唐代墓葬2座。其中一座唐墓出土两方墓志,据墓志记载,墓主下葬于公元900年,两座唐墓均为晚唐遗存。本次发掘共出土砖墓志、石墓志、铜镜、铜泡钉、铜钱、铁器、围棋子、陶罐等文物二十余件。

沙窝高晚唐墓为典型的砖雕仿木构墓葬,门楼与墓室均保留精美砖雕,其中门楼形制完整,门础、倚柱、封门砖、阙额、门簪、普柏枋、檐椽、筒瓦、正脊等构件齐全。墓室内砖雕包含直棂窗、桌椅、衣架等仿木构家具造型,部分构件残存红彩装饰,是唐代世俗建筑风貌珍贵的地下实物遗存,对研究晚唐山东地区建筑结构、家具形制等具有重要意义。鉴于此三座唐宋墓葬的重要价值,在平文物部门将此三座墓葬整体吊装,搬迁至菜屯乡凤凰山南保护展陈,这又是近期文物保护工作的一大亮点。

运河流韵 市井华章

展览的第三单元是“运河流韵 市井华章”,集中展示了聊城地区宋、元、明、清时期的最新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。宋金元时期聊城遗址遗存多与黄河泛滥密切相关。其中在平郑庄遗址为北宋时期聚落遗址,发掘发现房址、灶坑、灰坑、沟渠、围栏、挡水墙等各类遗迹,完整还原了遗址从兴建、长期使用到最终废弃的全过程,其中保存完好的宋代农田遗存,在北方黄泛区极为罕见。

阳谷东张遗址位于大布镇东张村东北,本次发掘实际揭露遗址面积2300平方米,探明各类古代文化遗迹274处,涵盖房屋、道路、灰坑、灶址等类型,出土陶器、瓷器、石器、兽骨、铁器、铜器、骨器等各类器物。通过地层与出土物分析,明确了阳谷县东张遗址的时代为五代末期至北宋早期,为黄泛区的遗址断代提供了标尺,为研究黄河变迁对人类活动、聚落适应性的影响提供了实证,是黄河—济水地区重要的考古新发现。

在平府前广场遗址是近年来山东地区延续时间长、出土文物数量多、文化内涵丰富的重要古遗址,部分出土器物为省内首次发现或大规模集中出土,可作为山东地区宋、金、元、明时期器物断代的标准器。特别是元、明、清时期的南方窑口(例如龙泉窑和景德镇窑)瓷器残片数量的增加,直观印证了京杭大运河通航后,运河商贸对鲁西地区民众生产生活的影响力持续提升。

本次展览中明代考古的最大亮点为莘县妹冢明墓发掘成果。2019年5月,莘县妹冢镇安庄村村民在修建蔬菜大棚时发现古墓葬,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协助莘县博物馆,对遭破坏的墓葬残存区域开展抢救性清理工作。该墓葬为异穴夫妻合葬墓,从残存三合土叠压关系可判定,东侧男性墓主下葬时间晚于西侧女性墓主,二人均为一棺一椁葬制。男性墓主尸骨已完全腐朽,女性墓主尸骨保存完好,呈僵尸状态。两座墓葬墓主身下自头部至脚部均出土铜钱七枚,可辨识钱币均为万历通宝。另出土褶裙、棉裤、单衣、棉被等纺织品共计17件(套)。

该墓葬为鲁西地区常见的明代三合土夫妻合葬墓。由于鲁西气候湿润、土壤酸碱度特殊,极不利于古代纺织品留存,此前本地考古发掘中从未有过明代纺织品出土的记载。而这座墓葬不仅出土了棉质制品,还有缎、绫、罗、麻等多种珍贵织物,织品绣工精湛,纹样兼具花卉云纹等传统纹饰与凤凰等祥瑞图案等。这一发现直观印证了京杭大运河通航时期,南方服饰文化向北传播,并深度影响鲁西地区的历史脉络。

本次莘县明墓考古的最大亮点与珍贵之处在于,莘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国内权威文物保护专业机构,对全部出土纺织品开展系统修复与常态化保护工作,目前所有织物文物保存状态完好,成为研究明代服饰美学、纺织工艺与民间社会生活的珍贵实物资料。受展厅展陈条件所限,这批珍贵文物未能在本次展览公开展出,实属遗憾。

躬身厚土 续存有方

每一次有计划的发掘都是对历史的守护,每一次探方里的深耕都满载着责任与执着。本单元“躬身厚土 续存有方”,以聊城17处重点考古工地为核心脉络,同时以表格形式系统梳理历年考古发掘工作时序,通过项目概况、发掘历程、文物修复、团队风采四大板块,全方位多角度展现新时代聊城考古“保护为先、抢救传承、科学发掘、严谨治学、活化利用、服务民生”的工作理念与职业精神。

考古成果总览以“近年来聊城市发掘项目一览表”开篇,直观呈现2014年以来25次考古发掘的时空分布。通过工地现场纪实照片、考古工具展示、考古日志摘录等,展示聊城考古工作者在高温严寒下的坚守、在细微遗存前的专注。让观众在了解文物之余,也记住那些躬身厚土、手铲释天的守护者群体。

此次展览既是对近年来聊城考古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,又是对“考古前置”政策成效的生动验证。从抢救性发掘到系统性保护,从零散发现到城市考古的体系化推进,聊城的实践表明: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,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建设并非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,而是可以统筹兼顾、相互成就的。随着“博州”王城的面纱被层层揭开,运河商贸遗存不断丰富我们对鲁西历史的认知,我们有理由期待,在考古工作者与文物守护者的共同努力下,聊城这座黄河与运河共同滋养的古城,还将为中华文明图谱贡献更多精彩篇章。

在位于聊城市东昌府区东关大街的傅斯年陈列馆东侧,有一条由青石铺筑而成的小巷,长约六十米,宽仅两米,便是“仁义胡同”。胡同南首立着木质牌坊,檐下正中是清康熙皇帝御笔亲题的“仁义胡同”四个大字;北首的影壁之上,也题写着这四个鎏金大字。这条看似普通寻常的小巷,承载着一个流传了数百年的动人故事,蕴藏着中华民族“仁爱”“礼让”“睦邻”的深厚文化基因。进入新时代,深入挖掘“仁义胡同”精神的时代价值,探索其传承创新的有效路径,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,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。

“仁义胡同”的历史渊源与精神内核

这条“仁义胡同”的故事,与清朝开国状元傅以渐紧密相连。傅以渐(1609—1665),字子磐,号星岩,今东昌府区人。他天资聪慧、博览群书,是清朝开国第一位状元,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,加太子太保,曾为康熙皇帝的老师,教授“四书”“五经”、天文等中国传统文化。他性格温和、与人和善、生活简朴、居官清廉,深受故乡亲人与民众的称赞。其治学严谨、学识渊博,被儒生学子尊称为“星岩先生”,有史官学者赞其“道德文章实为一时之冠”。

据传,康熙年间,傅以渐的家人在聊城东关家庙拓修建设时,新建院墙盖住了邻居的地基。邻居认为有碍自家风水,遂找上门来。傅家宅院刚刚修缮完毕,不愿额外增加开支,双方发生纠纷,一时相持不下。家人于是写信给在京为官的傅以渐,希望他利用威望向地方官施压。傅以渐见信后,当即回书一封:“千里来书只为墙,让他三尺又何妨?万里长城今犹在,不见当年秦始皇。”家人读罢回信,深感惭愧,主动将墙基后退三尺,并登门向邻居道歉。邻居见相府人家如此仁义,深受感动,也主动后退了三尺。两家各退三尺,便形成了傅氏祠堂东邻这条宽约两米的“六尺胡同”。后来康熙皇帝南巡驻蹕聊城,闻听此事,深受感动,亲笔题写“仁义胡同”四字以示褒扬,这一名称由此沿用至今。

据学者考证,全国以“仁义胡同”或“六尺巷”命名的地点不下百处。就聊城而言,有两大亮点与众不同:第一,其他同类地点多以“六尺巷”定名,聊城这里因康熙皇帝御笔亲题得名“仁义胡同”,直接将“仁义”二字作为精神标识嵌入地名,更彰显了谦让包容的精神;第二,多数同类传说缘于普通民众的邻里纠纷,而聊城“仁义胡同”的故事,出自聊城的名门望族,故事主人公傅以渐是清代首位状元,官居要职,却从未倚仗权势满足家族私利,反而主动劝说家人放下争执、主动退让,这种身居高位仍能守礼谦和的品格,让仁义谦让的精神更具榜样分量。这则故事把“仁义”二字深深烙印进了聊城的文化根脉,塑造了当地崇文尚德、谦和包容的人文底色,是聊城地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组成部分。

从精神内核来看,“仁义胡同”的故事包含着三重深刻意蕴:第一重是“让”的精神,是遭遇利益冲突时主动退让、避免纷争的智慧与胸怀;第二重是“仁”的品格,是以善良宽容之心待人、尊重他人合法权益的仁爱之心;第三重是“义”的担当,是秉持正义公平原则,绝不恃强凌弱的道德操守。这三种精神相互交融,共同构成了“仁义胡同”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,也成为邻里相处、人际交往应当遵循的基本道德准则。

“仁义胡同”故事的时代价值

“仁义胡同”虽诞生于三百余年前,但其精神内涵跨越时空,在当代社会依然焕发着强大的生命力。深入审视“仁义胡同”故事的时代价值,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加以把握。

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看,“仁义胡同”的故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。富强、民主、文明、和谐,自由、平等、公正、法治,爱国、敬业、诚信、友善——这二十四字核心价值观中,“文明”“和谐”“公正”“友善”等关键词,都可以在“仁义胡同”的故事中找到生动的诠释。傅以渐以“让他三尺”的胸襟化解矛盾,体现的正是文明友善的待人之道与和谐共处的处世智慧。聊城市坚持深挖“江北水城·两河明珠”地域文化底蕴,通过代表性精神符号的紧密结合与广泛拓展,赓续精神血脉、涵养家国情怀、传承优秀文化,凝聚全社会价值认同。“仁义胡同”正是这样一个承载着深厚文化底蕴的精神符号。故事将“谦和礼让、仁义为本”的处世哲学融入一方水土的文化基因,既浸润着聊城当地百姓代代相传的道德追求,也为新时代开展公民道德建设、培育时代新风提供了接地气的本土载体。

从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看,“仁义胡同”所体现的“礼让”“和谐”理念,为化解社会矛盾、构建和谐邻里关系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资源。当前,社会转型期各类矛盾叠加,许多当事人常因一墙之地、一屋之争等小事对簿公堂,昔日和睦的邻里、亲人反目成仇。如果每一方都能“退让三尺”,谦让一步,许多纠纷便可迎刃而解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礼让、仁义一直是一种备受推崇的做人境界。《论语》云“礼之用,和为贵”,强调以和睦友善的态度处理各种关系;《周易》言“地势坤,君子以厚德载物”,展现器量宏大的宽广胸怀。这些传统智慧在当代社会治理中依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。聊城当地法院将“仁义胡同”典故以图片配文字的形式,把一个大大的“让”字镶嵌其中,安置在调解室墙面中央,营造温馨的调解环境,引导当事人互相谦让。阳谷县人民法院景阳冈人民法庭充分践行新时代“枫桥经验”,巧用“仁义胡同”邻里和睦理念,成功化解持续数月的邻里纠纷。这些实践表明,传统美德与现代治理相结合,能够产生化解矛盾、促进和谐的积极效果。

从文化自信的建构看,“仁义胡同”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活载体,是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资源。胡同作为古城历史和文化的载体,蕴藏着丰富的民俗风情和精神气质,传递出和谐、友善的社会价值。在城市化进程加速的今天,唯有历史街区、传统文化才能显示一座城市的身份和市民的文化归宿。“仁义胡同”历经数百年风雨而保存至今,本身就是中华文化绵延不绝的生动见证。其故事被改编为评剧、山东琴书等多种艺术形式。其中,山东琴书《“仁义胡同”的故事》于2024年立项为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,由泰山文艺奖获得者、山东琴书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负责创作。该作品立意深远、取材典型、特色鲜明,生动具体地传承弘扬了“礼让”“仁义”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。这种以文艺形式传承文化基因的做法,对于增强民族文化认同、坚定文化自信具有深远意义。

“仁义胡同”故事的传承创新路径

传承“仁义胡同”的文化精神,不能仅仅停留在静态保护层面,而应当积极探索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有效路径,让这条古老胡同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。

第一,深化文化内涵的挖掘与研究。当前,关于“仁义胡同”的传说虽然流传甚广,但在史料考证、内涵阐释、价值评估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深化。相关部门可组织由地方志志、文化学、社会学等领域专家组成的研究团队,围绕“仁义胡同”的历史脉络梳理、精神内涵挖掘、当代价值阐释开展系统研究,整理汇编相关口述资料与研究成果,既能填补相关学术研究领域的空白,也可作为后续文化传播与传承利用提供了扎实的内容支撑。同时,可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和“仁义胡同”相关的口述史料、家族记载等民间资料,丰富研究内容,让“仁义胡同”的文化形象更加立体丰满。

第二,创新文化传播的手段和方式。聊城市傅斯年陈列馆已经面向全社会举办“仁义胡同”宣传推广金点子征集活动,公开征集创意策划方案,目的是借助多元创意与新兴媒介扩大“仁义胡同”的社会影响力,这一做法值得肯定与推广。具体来看,可以利用短视频、动画、虚拟现实等新媒体技术,生动还原“仁义胡同”的历史场景;开发“仁义胡同”主题文化创意产品,让传统文化融入大众日常生活;将“仁义胡同”纳入聊城精品文化旅游线路,让更多游客在实地探访中感受文化魅力。当前,聊城已依托状元府第、“仁义胡同”等文化地标,常态化开展研学宣讲活动,由老师带领青少年实地探访,讲述先贤礼让、勤俭持家的历史往事,这种沉浸式文化教育方式,对青少年传承文化精神具有深远意义。

第三,推动文化与治理的深度融合。“仁义胡同”的文化精神不应仅仅停留于历史记忆,而应当转化为当代社会治理的现实力量。东昌府区创新推进“信义东昌府”建设,构建“1+3+5+N”工作模式,将传统道德与公益行为纳入信用评价。东关街作为紧邻“仁义胡同”遗址的历史商业街区,依托仁义文化赋能商户信用体系建设,既是对本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,也是将基层治理经验向商业场景的延伸探索。具体而言,可以在东关街设置“仁义胡同”文化展示区,通过图文展板、触控互动屏等形式,直观展示“仁义胡同”的历史沿革和礼让精神内涵,引导来往商户与游客感受文化浸润;同时,可以发起“诚信经营 礼让待人”示范商户评选活动,把践行仁义理念纳入商户经营评价标准,对获评商户给予挂牌表彰和政策扶持,引导经营主体自觉诚信经营、友善待客,让古老仁义精神成为规范商业秩序、凝聚经营共识的精神纽带,为街区治理注入文化温度,也让传统文化精神在当代基层治理场景中落地生根,持续滋养城市文明与社会风尚。

第四,注重活态传承与代际传递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在于活态传承。山东琴书作为首批国家级非遗项目,以说唱艺术的形式讲述“仁义胡同”的故事,让传统美德在艺术欣赏中深入人心。这种“以艺载道”的传承方式,既保留了传统文化的韵味,又赋予了时代的气息。应当进一步拓展传承载体,将“仁义胡同”的故事融入学校德育课程、社区文化活动、家庭家风教育等各个层面。通过丰富多彩的精神纽带,让仁义精神从书本走向生活、从历史走向现实,在潜移默化中滋养人们的心灵。

一条窄窄的胡同,承载着厚重的文化;一个“让”字,蕴含着深刻的智慧。聊城“仁义胡同”的故事虽小,却折射出中华民族“以和为贵”“讲信修睦”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品格。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,深入挖掘“仁义胡同”的时代价值,积极探索传承创新的有效路径,让这条古老的胡同在新时代绽放新的光彩,既是对历史的敬畏与尊重,也是对未来的责任与担当。正如胡同虽短,其义绵长;巷陌虽小,其德流芳。“仁义胡同”所承载的精神财富,必将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中持续释放能量,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。

【本文系2026年度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大项目「聊城‘仁义胡同’时代价值与传承创新研究(GHXM2026008)»阶段性成果】

聊城「仁义胡同」故事的时代价值与传承创新

■ 胡梦飞

